

# 从史家之心到诗人之眼

## ——杜甫《洗兵马》史事及主旨新证

卢多果

**内容提要** 杜甫《洗兵马》系年及主旨乃杜诗学中的著名公案。以诗中着墨最多的张镐为切入点，由其仕宦经历，可以考订《洗兵马》作于乾元元年三月，此时张镐正为肃宗重用。由此系年可知，诗中的“萧丞相”为宰相苗晋卿而非房琯。诗中反映了对肃宗所亲任官僚的褒美，而非对复用玄宗旧臣的希冀。“鸡鸣问寝”及太子之典与肃宗当时着力塑造的孝子形象有关，皆非讽喻，而是体现了时人眼中的玄肃关系，钱谦益的“刺肃宗”说乃据史书所知的后见之明。此诗主旨是对肃宗君臣中兴功绩的赞颂，与玄肃矛盾无涉。

**关键词** 杜甫；钱谦益；苗晋卿；《洗兵马》；乾元元年

《洗兵马》被王安石推为杜集压卷之作<sup>[1]</sup>，也是讨论杜甫政治立场和创作心态不可绕过的重要材料，从系年、史事到主旨，历代注家聚讼纷纭，已成杜诗领域的著名公案，至今仍无定讫。

关于其系年，《杜陵诗史》《草堂诗笺》从旧次编在“（至德二载）八月还鄜州及扈从还京所作”<sup>[2]</sup>，宋人黄鹤始因“‘田家望望惜雨干’，以二年春无雨”改动旧次，定在乾元二年（759）春<sup>[3]</sup>。此后，主张该诗作于乾元二年春的说法占据主流，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萧涤非等皆持此说。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持乾元元年（758）说，并有所辨证<sup>[4]</sup>。尽管举证有力，吴氏之说并未引起重视，至二十世纪后期，洪业、四川文史馆、詹锳、徐树仪等学者才先后考辨此诗当作于乾元元年春<sup>[5]</sup>。詹、徐二人举证最为详尽，此后持此说的学者基本未超出其论述范围<sup>[6]</sup>。徐树仪之文曾引起较大的争论，支持萧涤非乾元二年说的廖仲安撰文予以反驳，争论焦点则是乾元元年抑或乾元二年唐军更占优势<sup>[7]</sup>。此后，林继中亦倾向于乾元元年说，但其误以李泌当“幕下复用张子房”，且主要以同期诗歌风格的类比推论“作于唐肃宗乾

元元年春的可能性较大”<sup>[8]</sup>。新近出版的《杜甫全集校注》，仍持乾元二年说<sup>[9]</sup>；谢思炜《杜甫集校注》则两说并存<sup>[10]</sup>。

关于本诗主旨，以钱谦益说影响最大：“《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sup>[11]</sup>钱氏展开论述的基本前提，是对肃宗迫害房琯、张镐等玄宗旧臣的揭示，占据了笺注的绝大篇幅。其切入点，则在于对“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鹤禁通霄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两句的解读。杜甫因此对肃宗之“不修子道”提出讽谏，“不欲成其乎君”，并希冀房琯、张镐等人得以任用，予玄宗以尊崇。尽管朱鹤龄、潘耒、浦起龙曾相继提出批评，但由于钱谦益的诗学盛名，以及他的立论前提并未被真正颠覆，其观点依然常为研究者沿用，至今仍不乏赞同者<sup>[12]</sup>。

研究者对《洗兵马》的阐释，多着眼于史料与诗歌文本的贴合互证，却较少注意该诗的叙事结构与所涉人物包含的关键线索，尤其是诗歌本身相对于后世史书的特殊性，以及杜甫当时所处的历史情境，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关中既留萧丞相，幕

下复用张子房”涉及两位人物的身份及历史作用，研究者至今未得确解，然而，此句是钱谦益“刺肃宗”说立论的根基，不仅关系到诗歌系年，更直接导向对主旨的不同解读。以不可靠释读为出发点而做出的判断，自然是难以采信的。因此，我们不妨搁置关于主旨的争议，由诗歌文本涉及的具体人物入手进行考察。

## 一 张镐的仕宦与《洗兵马》作年

张镐是诗中最为独特的人物，全诗刻画多名中兴功臣，占据最多篇幅的，却是声名相对不显的张镐。有学者由此生疑，认为不应五句皆言张镐<sup>[13]</sup>。不过，“幕下复用张子房”与“张公一生江海客”两句显然为顶针句式，不可分指两人。宋人对此早有疑惑，《蔡宽夫诗话》称：“镐虽史称有王霸大略，然当为相，收复两京时，不闻别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阳归顺为伪，知许叔冀临难必变二事耳。然当时亦不果用也。岂史氏或有遗邪？”<sup>[14]</sup>葛立方指出：“甫为右拾遗，会瑄罢相，上疏力救瑄，肃宗大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救之获免。……盖感其救己也。”<sup>[15]</sup>谢注则认为：“此诗誉张镐亦有夸张处，不必过究。”<sup>[16]</sup>

此诗有清晰的时间脉络，以“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为界，分叙肃宗归长安前后之事。功在收复两京的李俶、郭子仪居于前半，而“萧丞相”、张镐则在后半予以叙述，可见杜甫对他们的认识有所不同。由此自然产生的疑问是，张镐在杜甫写作当时，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为何他独占五句？钱谦益认为：“玄宗旧臣，遣赴行在，一时物望最重者，无如房瑄、张镐。瑄既以进明之谮罢去，镐虽继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sup>[17]</sup>这一判断是否符合当时实际？厘清张镐的政治生涯及其历史作用，正是解开《洗兵马》之谜的关键线索。

旧注对这一话题往往模糊带过，但根据杜甫的描写，在收复长安后，张镐的地位应是举足轻重的，杨伦指出：“镐之才胜于瑄，乃公所尤注意以赞中兴者，故申说独详。”<sup>[18]</sup>而乾元二年春，张镐已被罢相，其政治生命此后遂告消歇。这一点已为

赞成乾元元年说的学者所留意，但他们对张镐的作用仅停留于他时任宰相的笼统印象，如詹锜说：“‘关中既留萧丞相’两句是说房瑄仍然留在长安，只是宰相之位已经由张镐继任了。……他认为郭子仪、李光弼都是深于谋略、识鉴锐敏、能以‘整顿乾坤’的将领，而在政治上又有张镐做宰相，他善于筹策，能以‘起颠扶危’。”<sup>[19]</sup>

但事实上，张镐当时已不在朝中任职，《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八月）己丑，以平章事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处置等使。”<sup>[20]</sup>张镐早年隐居不仕，以名士自诩，在京师享有盛名，此即“张公一生江海客”。他在天宝末由杨国忠所荐，以布衣任左拾遗，不久随玄宗入蜀，又奔赴凤翔，得到肃宗亲任，超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却是在出任河南节度使之后。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的叛军席卷南下，陈留、荥阳、东都先后陷落，又于十五载（756）六月攻破潼关和长安。在此形势下，河南成为战争的焦点。李碧妍指出：“因张巡等人死守睢阳一线长达年余，叛军错失了南下江淮的机会，而江淮地区恰是帝国的财赋来源地。……显然，唐廷不可能无视河南的重要性。事实上，早在安禄山起兵的当月，玄宗就下令‘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这是唐廷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于内地设立的第一个藩镇，其意义当然不可能被轻视。”<sup>[21]</sup>叛军一旦占据河南地区，作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江淮贡赋便无法经由水路运往关中，唐廷的经济命脉也会被叛军扼断。双方在睢阳、南阳一线相持长达近两年之久，尤其是南阳陷落后，睢阳成为两军对峙之处。当时人无疑深知睢阳的战略意义，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救时，便直言“睢阳既拔，即及临淮，皮毛相依，理须援助”<sup>[22]</sup>。

张镐正是在此时承担挽救局势的重任，被派往河南战场，他是此时肃宗颇为信用的重臣，也深知此行目的所在。《通鉴》至德二载十月：“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晓素傲很，不受镐命。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镐召晓，杖杀之。”<sup>[23]</sup>尽管睢阳陷落，张镐的援兵却缓解了河南

的战局，与此同时，广平王率郭子仪收复东都，危机随之化解。《通鉴》至德二载十月：“安庆绪走保邺郡……诸将阿史那承庆等散投常山、赵郡、范阳。旬日间，蔡希德自上党，田承嗣自颍川，武令珣自南阳，各帅所部兵归之。”<sup>[24]</sup>随后，广平王和郭子仪自东京回长安告捷，张镐跃居收复失地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通鉴》至德二载十一月：“张镐帅鲁灵、来瑱、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皆下之；惟能元皓据北海，高秀岩据大同未下。”<sup>[25]</sup>杜甫直接见证了张镐出镇直到收复河南、河东，正是这一时期，张镐的政治地位真正达到了顶峰。他不仅完成了拯救河南危局的重任，使战火未能延及江淮，还顺势收复河南、河东失地，堪称“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张镐在诗中俨然成为盖过其他中兴功臣的显赫人物。《旧唐书·张镐传》：“及收复两京，加镐银青光禄大夫，封南阳郡公，诏以本军镇汴州，招讨残孽。”<sup>[26]</sup>至德二载十二月，史思明、高秀岩先后请降，《通鉴》至德二载十二月：“乌承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sup>[27]</sup>《通鉴》乾元元年二月：“安庆绪所署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举所部来降。”<sup>[28]</sup>朝廷已在名义上完成了对河北的统一，对于此刻的唐廷君臣来说，攻下相州只在早晚之间，即“只残邺城不日得”。至德二载十月至乾元元年五月之间，张镐在战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理解了这一历史情境，杜甫在诗中对他大力褒扬，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乾元元年五月后，张镐与肃宗在纳降史思明之事上有所分歧，罢职授荆州大都督长史，从此远离战场与中枢。直到史思明复叛、乾元二年九月许叔冀附逆后，张镐始被征为太子宾客，此后又因嗣岐王案外贬。诗中的“复”并非“复出”的“复”，而是与前句之“既”相对，为“又”之意。“幕下复用张子房”，与前句朝中的萧丞相相对，指张镐当时正被任用为军幕。认为罢授荆州大都督长史同样也可称为“复用”的学者并不了解，被贬为这一职位，对于一名唐代宰相来说，近乎政治上的边缘化。张镐的特殊性只会在某个具体的时间段中得到

体现，而乾元二年三月的杜甫，在论叙时人事功时，没有理由再在诗中大力表彰一位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已无足轻重的人物。这反过来也证明，《洗兵马》一诗只有可能作于乾元元年五月张镐失势前。又《旧唐书·肃宗纪》：“（乾元元年三月）甲戌，元帅楚王俶改封成王。”<sup>[29]</sup>此诗已言“成王”，则不应早于乾元元年三月。又由诗中描写的春日之景“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可知，该诗当作于乾元元年三月前后，题下小注“收京后作”便是极为恰切的佐证。

从后世对安史之乱的整体叙述看来，乾元元年未必显得有那么举足轻重，张镐的历史功绩也掩埋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声名之下。但对于正处在历史进程中的唐廷君臣来说，他们无法预料局势的反复，乾元元年确为标志性的转折，张镐则是推动这一胜利的关键人物。正如杜甫在当年的诗中写道：“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送李校书二十六韵》）<sup>[30]</sup>然而战局的演变往往出人意料，到本年年底，形势忽然逆转，郑文指出：“盖乾元元年十二月，魏州失陷，唐军三万被歼，乾元二年正月李嗣业战死城下，唐军自冬涉春，城不能下，军无统帅，将各异心，转输无继，财尽粮竭，形成败溃之势，岂是‘中兴诸将收山东’之时哉！”<sup>[31]</sup>在新的严峻局势下，张镐短暂的功绩与中兴的喜悦无疑会被迅速淡化，只有对于乾元元年春天的人们来说，张镐的重要性才是空前强烈的。概而言之，当杜甫写作《洗兵马》之时，张镐乃肃宗最为信用的臣僚之一，钱谦益关于其“虽继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的判断并不符合史实。

## 二 “关中既留萧丞相”考

《洗兵马》诗所述中兴功臣，至今仍未考实者乃“萧丞相”。将其释为房琯，是目前最通行的说法，也是钱谦益“刺肃宗”说的重要前提。只有彻底厘清“萧丞相”的身份，才有可能颠覆钱氏的立论，并对本诗的主旨产生全新的认识。

前人已辨萧丞相不可能为萧华，因其陷于叛军，至乾元二年才回到长安<sup>[32]</sup>。此外，赵次公注：“谓郭子仪也。”<sup>[33]</sup>谢注也说：“本书卷一七《秋日

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势惬宗萧相。’注：‘郭令公’。盖甫自注。以彼证此，则此诗萧丞相亦当指郭子仪。虽前已云‘郭相谋深’，然叙事不同，不嫌重复。”<sup>[34]</sup>但这一时期，郭子仪的行踪有较为明晰的记载，与“关中既留”的描述无法契合。《旧唐书·郭子仪传》：“（至德二载十一月）寻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灊上。……十二月，还东都，命子仪经营北讨。”<sup>[35]</sup>至德二载十二月后，郭子仪一直在河南收复失地，至乾元元年七月始入朝，不久又返回河南，始终不曾长时期居留在关中。因此，“萧丞相”定不指郭子仪。

此外，《草堂诗笺》：“按《唐书·裴冕传》：‘从太子至灵武，与杜鸿渐、崔漪同辞劝进，太子喜曰：‘灵武，我之关中。卿乃吾萧何也。’’”<sup>[36]</sup>可见《草堂诗笺》或以“萧丞相”属裴冕。然此文实出自《新唐书·杜鸿渐传》，引者有所删改，据原书之文，肃宗所指萧何实为杜鸿渐。杜鸿渐、裴冕在肃宗即位初以定策之功深得信任，但当时杜鸿渐并未在朝任相，《旧唐书·杜鸿渐传》：“至德二年，兼御史大夫，为河西节度使、凉州都督。两京平，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荆南节度使。”<sup>[37]</sup>以此句属裴冕同样不洽，《旧唐书·裴冕传》：“肃宗移幸凤翔，罢冕知政事，迁右仆射。两京平，以功封冀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sup>[38]</sup>当时裴冕已被罢相，《洗兵马》中的“萧丞相”也不可能指他。

至于前人多谓“萧丞相”指房琯，谢注已有所驳正：“当此喻者必尝居相位。然房琯至德二载五月罢相位，乾元元年六月并从贬秩。钱笺有意反诸旧说，谓肃宗疑玄宗旧臣，琯、镐皆用而不终，故以此句属房琯。其实不无可议。”<sup>[39]</sup>房琯于至德二载五月罢相后，便已被排挤出权力中心，《通鉴》乾元元年六月：“太子少师房琯既失职，颇怏怏，多称疾不朝，而宾客朝夕盈门，其党为之扬言于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上闻而恶之，下制数琯罪。”<sup>[40]</sup>杜甫作《洗兵马》时房琯已是失意官僚，若将其比作“萧丞相”，并与军事上正当大用的张镐对言，实为不辞；因为“关中既留”用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史记·萧相国世家》）

之典<sup>[41]</sup>，显然此人在杜甫写作时居关中显位，主掌内政，方可与“幕下”相对，以此指房琯也不可信。

在全诗的叙事脉络中，言及“萧丞相”在肃宗归京后，可见其当时仍担任宰相。以“萧丞相”指早已罢为散位的故相或非宰相之大臣，则用典不惬。查《新唐书·宰相表》：“（至德二载）三月辛酉，（韦）见素罢为左仆射，（裴）冕罢为右仆射。宪部尚书致仕苗晋卿为左相。五月丁巳，琯罢为太子少师。……八月甲申，（崔）涣罢为左散骑常侍、余杭郡太守。……十二月甲寅，晋卿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午，（崔）圆为中书令，（李）麟同中书门下三品，晋卿行侍中。”<sup>[42]</sup>乾元元年三月时在朝任相者仅有苗晋卿、崔圆、李麟。

崔圆、李麟并非肃宗所信任的大臣，由于玄宗之际中枢的二元格局，“唐肃宗即位之初，仅有裴冕一人为同平章事即宰相。唐玄宗于至德元载八月为其行册命时，成都的四位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崔圆）除崔圆外均派到唐肃宗身边。次年正月，唐玄宗任命李麟为宰相后……又将崔圆派来”<sup>[43]</sup>。这五位宰相的任用，体现出玄宗试图对朝局有所干预；除了“因言时事，词情慷慨”而得到肃宗信任的房琯外，韦见素、崔涣很快便被罢相。崔圆、李麟虽然晚至乾元元年五月才被同日罢相，但由于旧臣的身份，在肃宗朝并不得志，《旧唐书·韦见素传》：“及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sup>[44]</sup>就连同为旧臣的房琯也对崔圆不以为意，《旧唐书·房琯传》：“崔圆本蜀中拜相，肃宗幸扶风，始来朝谒。琯意以为圆才到，当即免相，故待圆礼薄。”<sup>[45]</sup>崔圆因厚结李辅国的缘故，得以保全相位，但并未得到肃宗的亲信。在《洗兵马》创作稍后，他与李麟便被同日罢相，在任上亦无建树，与“萧丞相”的地位不相契合。

苗晋卿则全然不同，他是裴冕之后肃宗亲自委任的第一位宰相。《旧唐书·苗晋卿传》：“会肃宗至凤翔，手诏追晋卿赴行在，即日拜为左相，军国大务悉以咨之。既收两京，以功封韩国公，食实封五百户，改为侍中。后以贼寇渐除，屡乞骸骨，优诏许之，罢知政事，为太子太傅。明年，帝思旧

臣，复拜为侍中。”<sup>[46]</sup>在同时众相之中唯他由肃宗亲授，辅佐内政，自然也是肃宗最为宠信者，意义非同寻常。

在肃宗朝的政治仪式中，也能看出苗晋卿作为“首相”的尊贵地位；《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百僚班于含元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晋卿率百辟称贺，人人无不感咽。”“左相苗晋卿为侍中、封韩国公，宪部尚书、平章事李麟褒国公，中书侍郎崔圆为中书令、赵国公。”<sup>[47]</sup>《旧唐书·苗晋卿传》：“玄宗崩，肃宗诏晋卿摄冢宰。……数日，肃宗晏驾，代宗践祚，又诏晋卿摄冢宰。”<sup>[48]</sup>苗晋卿于在任诸相中地位最尊，自无疑问。

苗晋卿看似与杜甫毫无瓜葛，但其实二人时常相见，杜诗中不止一次出现他的身影，如《紫宸殿退朝口号》：“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sup>[49]</sup>此诗作于乾元初，“夔龙”正指时任宰相的苗晋卿、崔圆、李麟，因为在退朝时，作为拾遗的杜甫需奉送宰相至中书门下<sup>[50]</sup>。《奉答岑参补阙见赠》：“窈窕清禁闼，罢朝归不同。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sup>[51]</sup>补阙属中书省，拾遗属门下省，此时中书门下设于中书省，故退朝后岑参可随丞相前往，杜甫则在奉送宰臣后归门下省。除了朝参时的会面，苗晋卿此时带侍中衔，任职于门下省的杜甫，名义上还是苗晋卿直接的属官，杜甫对他自然极为熟稔。只是历来注家都不曾深究“夔龙”“丞相”何指，苗晋卿遂不免成为了杜甫生命中的失踪者。

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才有助于我们考察“萧丞相”究竟为谁。对于杜甫自己，以及有可能读到此诗的肃宗朝同僚、亦即杜甫所期待的读者群体来说，谁是“萧丞相”理应一目了然。《旧唐书·苗晋卿传》：“及秉钧衡，小心畏慎，未尝忤人意。性聪敏，达练事体，百司文簿，经目必晓，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议者比汉之胡广。”<sup>[52]</sup>对于当时群僚来说，他们心目中最尊贵的文臣只可能是苗晋卿，也只有其资历与身份得以享有如此尊贵的比况。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逐一厘清了《洗兵马》诗中所涉人物，亦即李俶、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苗晋卿、张镐。这一系列人物并不关涉所谓玄

宗旧臣，所谓“二三豪俊为时出”，实与肃宗的用人布局有关。更值得一提的是，张镐此时正当大用，《洗兵马》中全然不提及房琯，表现出的反倒是对肃宗群僚的称许与褒美。因此，钱谦益重点论述的肃宗“以谗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贤臣”实为无的放矢，杜甫并未在诗中表达对复用玄宗旧臣的希冀。钱谦益就房琯之事而推衍出关于本诗主旨的众多阐发，完全没有根据。

### 三 “圣朝新孝理”： 时人眼中的玄肃关系

钱谦益将“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视作对肃宗的直接指斥，钱笺：“肃宗即位，下制曰：‘复宗庙于函洛，迎上皇于巴蜀，道銮舆而反正，朝寝门而问安，朕愿毕矣。’……此诗援据寝门之诏，引太子东朝之礼以讽喻也。‘鹤驾’‘龙楼’，不欲其成乎为君也。”<sup>[53]</sup>钱氏的思路是，肃宗并未履行“朝寝门而问安”之诏，杜甫却有意拈出此事；“鹤驾”“龙楼”为太子相关之典故，而杜甫用以指肃宗，暗涵贬抑之意。

然而，钱笺对“问寝”出处的引证并不确切。之所以因太子之典而生疑，还在于未将此诗置于乾元元年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理解<sup>[54]</sup>。乾元元年正月，玄宗诰文中曾称许肃宗：“往在韶年，素彰岐嶷。洎乎问寝，日增孝敬。”<sup>[55]</sup>杜甫书写“鸡鸣问寝”一事，与当时官方文书的表述别无二致。而用太子之典，将肃宗定位为勤于问寝的孝子，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不仅并非对皇帝身份的贬抑，反而是肃宗有意彰显的选择。

从迎接玄宗归京起，肃宗就着意塑造自己孝亲的形象，这也是巩固皇位合法性的必由之途：

（至德二载）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贤官奉迎。上皇御官南楼，上望楼辟易，下马趋进楼前，再拜蹈舞称庆。上皇下楼，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呜咽，不能自胜。遂扶侍上皇御殿，亲自进食；自御马以进，上皇上马，又躬揽辔而行，止之后退。上皇曰：“吾享国长久，吾不知贵，见吾子为天子，吾知贵矣。”上乘马前导，自开远门至丹凤门，

旗帜烛天，彩棚夹道。士庶舞忭路侧，皆曰：“不图今日再见二圣！”百僚班于含元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晋卿率百辟称贺，人人无不感咽。礼毕，上皇诣长乐殿谒九庙神主，即日幸兴庆宫。上请归东宫，上皇遣高力士再三慰譬而止。<sup>[56]</sup>（《旧唐书·肃宗纪》）

在公众视野下，通过臣民的共同参与和见证，肃宗以孝子的身份，营造自己与玄宗的和谐关系，同时也得到了舆论的认可，使玄宗亲口说出“见吾子为天子，吾知贵矣”。在至德二载十二月的封赏中，扈从成都和灵武的功臣得到了相等的优厚待遇。何况在当时，玄宗尚有一定的话语权，肃宗不可能忽视其所掌握的政治力量。《通鉴》至德二载十二月记有肃宗欲免张均、张垍死而为玄宗所阻之事，据《考异》，此事采自柳理《常侍言旨》<sup>[57]</sup>。即使未必属实，至少可以反映在唐人看来，从蜀中归朝的上皇，并未完全丧失权威。

在杜甫写作《洗兵马》当年，肃宗屡有尊崇玄宗之举，“孝”是这一时期官方文书中反复出现的语汇。《旧唐书·肃宗纪》：“（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册皇帝尊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上以徽号中有‘大圣’二字，上表固让，不允。”<sup>[58]</sup>徽号中的“孝感”二字，也可看出时人或是肃宗渴望彰显的某种态度。在此次上尊号的仪式中，肃宗反复推让，无论是大臣的上奏还是玄宗的诰文，都屡次提及“孝”，如玄宗诰文云：“尔亲率百僚，至于再请，则蒸蒸之孝，实覲于当今。”<sup>[59]</sup>《旧唐书·肃宗纪》：“（乾元元年二月）乙巳，上御兴庆宫，奉册上皇徽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大帝。”“（四月）戊辰，上进炼石英金灶于兴庆宫。”<sup>[60]</sup>在肃宗进献丹灶后，玄宗认为应将此孝亲之举宣示天下：“色养之勤，书册不载，寤寐嘉叹，深慰于怀。宜颁示天下，宣付史馆。”肃宗则以臣子身份上书谦谢：“臣幸以菲才，叨膺宝历，圣慈曲眷，每事忧兢。至于孝养之宜，臣子常礼，先意承旨，务达微诚。不期进奉之时，偶合圣旨，宁谓至诚能感，事近前知。以臣孝既由衷，物自冥应，特加奖饰，许载缣緌，在臣下情，弥增愧悚。”<sup>[61]</sup>乾元元年十一月，玄宗自华清宫归，肃宗亲往迎接：“帝至灞上迎候，下马趋进百余步，再拜舞蹈，

前抱玄宗足，玄宗抚帝背，帝又控辔行数十步，有命乃止。”<sup>[62]</sup>这一系列政治仪式，贯彻着肃宗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努力，换言之，只有不断巩固玄宗作为“上皇”的形象，同时使自己作为“孝子”出现，他的合法性才能持续巩固。

在当时的舆论话语中，也接受了肃宗作为孝子的形象。作于乾元二年的颜真卿《天下放生池碑铭》提及：“拯已坠之皇纲，据再安之宗社；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仪，浩誓所不及已。历选内禅，生人以来，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sup>[63]</sup>建放生池乃肃宗亲诏，从前后语境来看，颜真卿此文纯为褒美帝德之作，同样赞颂肃宗的“子道”“天子之孝”及问安之勤，可代表时人对玄肃关系的一种共同认识<sup>[64]</sup>。杜甫本人在乾元元年初所作《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观省》中，也提及“圣朝新孝理”<sup>[65]</sup>，指“去年十一月，迎上皇至京。是年正月，又加上皇尊号”<sup>[66]</sup>。如果将杜甫关于“鸡鸣问寝”的书写放置在乾元元年的政治语境中，不难发现，他对玄肃关系的描述与官方的主流书写完全吻合，用太子之典最为贴切。

而且，钱谦益认为此诗语含讽谏的另一潜在前提，是杜甫理应在玄肃矛盾中倾向于玄宗，而反对得位不正、有不孝之恶的肃宗。但实际情况是，尽管注家普遍倾向于强调杜甫对玄宗的忠诚，但却忽视了杜甫自入仕之初，就与肃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杜甫的释褐官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在朝廷分崩离析之际，他投奔肃宗行在；作为东宫属官，这样的选择不仅出自职责所系，同样也带有政治前途上的某种考虑。经过“陷贼”的波折，他最终被肃宗授以近臣之职。《述怀》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sup>[67]</sup>在朝期间，杜甫屡屡在诗中表达对肃宗的感激，他的政治生涯也与肃宗的恩宠有关。难以想象，他会否认肃宗即位的合法性，以太子之典贬抑其身份。

作为拥有后见之明的读者，我们已经得知后来肃宗对玄宗的迫害，遂默认《洗兵马》必然反映肃宗的“不孝”，认为诗寓讽喻实乃题中应有之意。但在《洗兵马》创作时，与钱谦益“不能尽子道”的指斥恰恰相反，肃宗正着力在公众视野中塑造孝

子的形象。杜甫用太子相关之典，并着力拈出“鸡鸣问寝”一事，不仅并无可怪之处，反而彰显了他对肃宗孝亲之德的认可与褒美。至少从现有的文本中，我们无法读解出讽谏之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玄肃矛盾的激化伴随着相当漫长的过程，对于正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是无从逆料的。吴小如指出：“钱牧斋的注过分强调此句有讽刺，其实这时还没到矛盾明显激化的地步。”<sup>[68]</sup>当肃宗已基本在舆论中巩固了自身地位后，他才有条件在朝中开始进一步的权力调整。乾元元年五月，作为玄宗旧臣的崔圆、李麟被同日罢相，但玄肃矛盾到此仍未公然激化，在史料中尚未出现肃宗对玄宗的公开打压。

玄肃关系的公开激化，至少要晚至乾元元年冬以后，这在高力士的回忆中亦可窥见端倪。郭湜《高力士外传》：“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诏迎太上皇于西蜀，十二月至凤翔，被贼臣李辅国诏取随驾甲仗。上皇曰：‘临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司。欲至城，皇帝具仪仗出城迎候。二圣相见，泣涕久之，倾城道路，一时怵舞。便于兴庆宫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温泉宫，二十日却归。因此被贼臣李辅国阴谋不轨，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sup>[69]</sup>研究者解读这段史料时，多据此认为早在至德二年十二月，李辅国“诏取随驾甲仗”，已经标志着肃宗开始对玄宗进行公开迫害。这固然可以视作肃宗对玄宗的有意防范，但如上文所论及的一系列事件来看，此时的肃宗显然不曾公开与上皇决裂。从高力士的视角来看，直到乾元元年冬玄宗幸温泉宫归后，才给了李辅国阴谋不轨、向肃宗进谗言的机会。归来时，肃宗亲自迎接玄宗，二人仍然以和谐的关系出现在臣僚面前。“移仗”指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将玄宗自兴庆宫移往西内之事，至此肃宗对玄宗的迫害才昭然若揭。高力士自然不可能意识不到李辅国的种种举动来自肃宗的授意，但他依然将这一系列祸端肇始于乾元元年冬，认为此后肃宗始被李辅国所蛊惑，而只把此前诏取甲仗的事件视为李辅国的个人行为。高力士的叙述无疑反映了身处历史现场的当事人视角，即使作为带有某种后见之明的追述，也至少可以反映，他对于乾元元年冬之前的肃宗并无非议，

这也与肃宗在乾元元年着力于塑造自己孝亲形象的效果吻合。而标志着玄肃矛盾公开激化的移仗事件，则在《洗兵马》写作的两年多以后。

位于乾元元年春这一时间点上的杜甫和高力士，以及稍晚的颜真卿，自然都不可能预见二帝最终决裂的结局。杜甫个人对玄肃关系的判断，不大可能超出朝中群臣的认知之上。从诗歌本身的叙述脉络来看，“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驾通宵风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描述的正是收复两京、至德二载十二月肃宗迎归上皇后的历史情景，与乾元元年春肃宗与群臣着力彰显的“孝”完全吻合，反映时人眼中的玄肃关系。如果仅据“鹤驾”为太子之典的表述，读解出“不欲其成乎为君”的讽刺，不仅不符合全诗的整体氛围、曲解了杜甫的政治立场，更忽视了乾元元年初杜甫所处的历史情境。

由上可知，钱谦益“复用玄宗旧臣”的立论前提，以及他据“鸡鸣问寝”出处、“鹤驾”之典读解出的讽谏之意全无依据，只是他据史书所知的后见之明，失于穿凿，《洗兵马》一诗的主旨与玄肃矛盾无关。但由于钱氏的盛名，这一推论依然持久地影响着杜诗学研究。而将《洗兵马》放置在乾元元年的政治语境中，以诗人的眼光，可以还原出更贴近历史现场的图景，围绕此诗解读的种种纷纭纠葛，亦可休矣。

## 余论 走出诗史互证的迷思

除去具体问题的讨论，此诗引起的相关争议，还可为我们所习用的“诗史互证”提供不少警醒。张镐和苗晋卿两位在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后世史家的叙述中最终变得暗淡；其事功和地位，反倒在杜甫的诗中得以凝固和存留。而研究者以史书所获得的观感，却不会将他们视为当时的重要人物。当我们试图用史料来贴合诗中的表述，便会难以避免地造成错位，甚至会因史书与诗歌的歧异而无端生疑。

除此之外，旧时的笺注者以他们从史料中所得的后见之明，往往过分夸大杜甫对历史走向的预见性。钱谦益等人将玄肃矛盾的激化，视作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当我们回到乾元元年春的历史现场，作为拾遗的杜甫正与同僚们一道分享收京之

喜，他的目光既不可能超出时人，更不可能与后代的历史叙述相吻合。他对玄肃关系的描写，与当时舆论中对肃宗“孝亲”的褒美相同。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尤其是肃宗的近臣，对他而言，构造这一中兴图景者，无疑是当时朝廷中最显赫的角色，诗中提及的人物，无一不是肃宗正在信用的官僚。他饱含期待所写下的《洗兵马》，也只可能是诗人此刻对于朝廷君臣的赞颂<sup>[70]</sup>。

以宋人和钱笺为代表的旧注，自始至终未曾脱离以史料比附文本的传统阐释方式，一方面是其所能够利用的材料有限，另一方面，其根本弊端在于，他们解读文本之时，始终未能对历史事件的现场性、阶段性予以足够重视。旧有的阐述方式看似对诗人的隐微寄托有所表彰，丰富了读者对其人格与形象的理解，实际上带来的却是极其扁平化的认识。研究者们将自己从史书中所得的知识与立场加诸杜甫身上，认为杜甫能如后世史家一般洞悉时局，他的思想感情与政治立场也成了静止的、不判自明的应然定律。杜甫与政治的关系则被简单地定格为“讽谏”，而在具体的历史时刻里，诗人面对时局的多重选择与复杂心理变迁，都被消解在这样的阐释方式下。

然而，史料的构成，本身已是一种后世视野下贯通的叙述，历史信息在某一线索下被重新取舍和剪裁，最终所呈现的叙事格局和面貌，可能已与当时人对历史的认识相去甚远。恰恰相反的是，诗歌的创作和表达往往带有具体的时刻性与现场性，更是不具后见之明的书写，作为彼时亲历者的叙述与眼光，有时反而更能贴近原始的历史图景。诗与史的叙述各有其特殊性，两种叙述之间的落差和矛盾往往难以完全相合，这也正暴露了传统意义上诗史互证的局限所在。在处理史料时，应该尽可能地把史家的判断与当时人对时事的有限认识区分开来，对“史”的因素怀有足够警惕，注意时人眼中时事与后世史家心中历史的区别。这一层面上，诗歌更具备一手史料的价值，同时也是另一意义上的“诗比历史更真实”。浦起龙曾言：“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若拈了死句，苦求佐证，再无不错。”<sup>[71]</sup>我们对于诗歌写作所处具体语境的重视，亦可以概括为从“史家之心”到“诗人之眼”的尝试，《洗兵马》

与史书记载之间的落差，及其所造成的歧解，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 王安石：《老杜诗后集序》，《王安石文集》，刘成国点校，第1466页，中华书局2021年版。

[2] 《王状元集百家注杜陵诗史》卷六，（旧题）王十朋集注，广陵书社1981年影印玉海堂影宋本；《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校证》，曾祥波校证，第3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3] 《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卷四，黄鹤补注，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月崖书堂刻本。

[4] “愚断此诗作于乾元元年二三月间，与单阳元合，盖张镐未罢相之时也。何以知之？以诗中成王二字知之也。按史，乾元元年二月，徙楚王俛为成王。夏五月，张镐罢。又是年立成王俛为皇太子。称成王之日，正张镐以宰相兼河南节度使之时。至五月罢相，成王已为太子，不得复称成王矣。……若既罢相矣，公方咨嗟叹息之不暇，亦何暇作期许殷恳、满心快意之笔如此哉？”吴瞻泰：《杜诗提要》，第112页，黄山书社2015年版。

[5] 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126; 《杜甫年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詹锜：《谈杜甫的〈洗兵马〉》，《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1962年5月13日，第4版；徐树仪：《〈洗兵马〉系年及解释辨误》，《草堂》1983年第1期。

[6] 如郝润华即用詹锜之说，认为“综合古今学者的考证研究，《洗兵马》作于乾元元年（758）一说当较为可靠。”参见郝润华、章蕾《杜甫〈洗兵马〉诗的创作主旨》，《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

[7] 廖仲安：《〈洗兵马〉系年再辨——答徐树仪同志》，《文史哲》1985年6期。

[8] 参见林继中《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林继中《杜诗〈洗兵马〉钱注发微》，《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3期。

[9] [32] 《杜甫全集校注》，萧涤非主编，第1252页，第12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10] [16] [30] [34] [39] [49] [50] [51] [65] [67] 《杜甫集校注》，谢思炜校注，第378页，第385页，第370页，第383—384页，第383页，第1576页，第1579页，第1617页，第1618页，第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11][17][53]《钱注杜诗》，钱谦益笺注，第67页，第67页，第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2]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李爽《〈钱注杜诗〉研究》，第81—1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邓小军《杜甫与李泌》，《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2期；郝润华、章蕾《杜甫〈洗兵马〉诗的创作主旨》，《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

[13]此五句皆指张镐，历来注家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唯林继中采清人梁运昌说，认为“幕下复用张子房”指李泌，“张公一生江海客”以下方指张镐：“至于所谓‘幕下’，当与军旅将帅有关，于李泌亦远比张镐贴切。”但林氏也指出：“此说尚无确证，推理居多，不敢言必，只是作为一种歧见，谨供参考。”参见林继中《杜诗〈洗兵马〉钱注发微》，《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3期。因《洗兵马》作于乾元时，从全诗脉络来看，此数句描述肃宗归长安后之事，而李泌参与军事行动则在收复长安前，此时已归隐，不可称为“幕下复用”，此说难以成立。

[1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第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5]葛立方：《韵语阳秋》，第2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8]《杜诗镜铨》，杨伦笺注，第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9]詹锬：《谈杜甫的〈洗兵马〉》，《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1962年5月13日，第4版。

[20][22][26][29][35][37][38][44][45][46][47][48][52][56][58][60]刘昉等：《旧唐书》，第246页，第4901页，第3327页，第251页，第3452页，第3283页，第3354页，第3278页，第3322页，第3351页，第249—250页，第3351—3352页，第3351页，第249页，第251页，第251—25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1]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16—1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首次揭示河南节度使一职及南阳、睢阳的重要战略意义，并具体辨析了不同政治势力在河南战场的斗争。

[23][24][25][27][28][40][57]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039页，第7042页，第7044页，第7048页，第7052页，第7056页，第7049—7050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31]郑文：《杜诗繁诂》，第175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

[33]《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林继中辑校，第23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6]《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校证》，曾祥波校证，第3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41]司马迁：《史记》，第201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4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693—1694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43]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81—28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4]浦起龙将“鹤驾”释为李俶，“凤辇”指肃宗，谓“父子相随以朝寝门”，以驳钱说。参见《读杜心解》，浦起龙注，第259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浦说常为学者引证，然此时李俶未封太子，难以成立，并未击中钱氏要害。

[55][59]《唐大诏令集》，宋敏求编，第38页，第38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61][62]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周勋初等校订，第276—277页，第277页，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63]《颜真卿集》，凌家民点校，第10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4]苏轼认为此碑寓讽谏意：“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是也，故以此谏。孰谓公区区于放生哉？”参见苏轼《题鲁公放生池碑》，《苏轼文集》，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第217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一解读实际上与宋人对唐肃宗“不孝之恶”的普遍指斥有关，参见洪迈《容斋随笔·五笔》，第850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66]《杜诗详注》，仇兆鳌注，第45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68]吴小如：《吴小如讲杜诗》，第10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69]《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丁如明辑校，第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0]如诗中所提及“攀龙附凤世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前人或谓指李辅国等佞臣，同样出于自史书所得的后见之明，事实上当时李辅国等人扈从肃宗，拥立有功，得到封赐并无不妥，杜甫实不必无端讥消。从诗中的前后语境看，“化为侯王”者实为当时滥得封赏的地方军事势力，作者尖锐地指出“汝等岂知蒙帝力”，其实只为申说尊王之旨，并非讽刺肃宗亲任佞幸。

[71]《读杜心解》，浦起龙注，第63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马勤勤